



武汉解封

1月28日

1月27日

1月31日

近一个月的开机率超过了去年一整年。

傍晚，孙芳戴上口罩、手套，步行到村口唯一开门的超市购买食物，孙芳通常两三天采购一次，每次花费150元。超市老板寒暄着：“还没上班啊？”孙芳不情愿地答了一声：“嗯。”孙芳在上海做钟点工，过去一个月工资能拿一万多元，这个收入在杨田镇算是很不错的，打工队伍中也算拔尖。但现在她不太愿意别人问起这件事。“一直没活干，我也很焦虑，吃饭的钱倒是有的，但能坚持多久呢？”

丈夫施玉国一边照顾着83岁的老父亲吃饭，一遍瞄两眼电视。看着云淡风轻，心里早已一团乱麻。施玉国在上海建筑工地做外墙保温工作，春节前，他接了南汇一栋16层居民楼的活儿，从早6点干到晚6点，吃住在工地。七八千元的工资本打算节后结清，这下全耽搁了。“松江区也接了一个，现在也没谱了，我一个大男人坐吃山空总不适合。”

老父亲是村里的党员，倒是拎得清楚。看出施玉国的心思，便嘱咐一家人：趁着空闲时间，多锻炼身体，摆正心态，等待复工。施玉国知道干着急也没用，但让一个习惯了务工节奏的人完全闲下来，实在是强人所难。对于生活并不富裕的他们来说，多挣点钱比消化那些大道理来得更踏实、更有安全感。

3月初，施玉国和工友商量着包车返回上海，车票商量下来是150元一个人，这个方案被孙芳否决。按照孙芳驻守工友的经验，现阶段返城一方面有隔离14天的成本，另一方面，人们心态上的戒备还未解除，恢复起来并不顺利。

从事家政行业5年的长宁区养老护理员张松，今年春节没有回家团聚。疫情发生后，多数老年人担心“社交接触风险”，所以常年服务的16个老人，缩减到只有1个要求提供服务，再加上家政公司只针对四级老人开放服务，护理员的工作并不多。

2020年4月5日，武汉一些市民来到久违的小吃店享受美食，熟悉的街头美味正重回武汉人的日常生活。



“我服务的这家老人快90岁了，她很信任我，我也希望做到位，每天骑着电动车上班，不坐电梯，进门消毒，戴口罩。”

张松清楚，复工是个缓慢的过程，现在每天上班只有时薪40元，只够吃饭钱，每月基本都在花银行卡里的积蓄。3月初，张松的儿子打来电话，要给她打钱，张松怕儿子担心，说：“我还有积蓄，不要紧。”实际上，张松面临的窘境，是整个家政行业的缩影，大家都在煎熬中寻找更多恢复的可能。

上海爱君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夏君说，为了减少家政人员的从业成本，他们尽量找一些800元—1000元区间便宜的宾馆专门给家政人员隔离，至少每天派送两个口罩、一瓶酒精喷雾剂，严格监控体温。“空闲时间，我们会开设供500人观看的在线课堂，每天两个小时，和服务人员互动，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。”但夏君也深知，真正的疏导，不只心理上的关爱，还要尽快安排家政人员提供服务，获得报酬。

艰难苏醒：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

“低收入群体并不知道有心理求助这一途径，他们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是健康人，并不需要这方面的指导。”上海惠迪吉公益人心理关爱中心的知晓老师说，春节后，他们开通了24小时心理支持热线，一个月共接听了1000多个心理求助电话。求助者有绝望中的新冠患者、有怀疑自己感染把自己封闭在房间的人，但这些人中唯独没有低收入群体。

4月5日，清明小长假，瞿强坐在窗户旁的沙发上，望着窗外武汉街头渐渐复苏的车流。老婆打来视频电话，嘱咐他要好好睡觉，好好吃饭。瞿强似乎也想开了许多，开始自我心理重建：“有债就慢慢还，只要我有勇气，就肯定打不倒。”

瞿强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武汉解封之后，他并没想到长远规划，但准备开始跑熟悉的服装业务，从大工厂接单，分发到小工厂，赚取订单差价。还好，打工几十年来，大小地方都跑过，也积累了一些行业人脉，大不了再重新开始。“有家人陪着，我也有底气了。”

知晓说，像瞿强一样的情况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，只要把温饱解决，找一个爱他、信任他的亲人倾诉，将难过的情绪切割掉，情绪中就会有爱的流动。“当一个人非常孤独的时候，看到的机会就减少了，如果从骨子里感受到支持和关爱，就会有东山再起的力量。”

安徽池州的一家三口也终于结束了无薪的日子。